

访谈 | 阿古智子 |
何欣洁 |

中国民主季刊

第3卷 第4期

2025年10月

CC-BY-NC-ND

自由、免费转载分发，但须注明
作者与出处，并不得修改及商用

中国公民运动的新 变迁：从维权世代 到后白纸世代



阿古智子



何欣洁

编按：“三年前你如果跟一些二十几岁、三十岁左右的行动者聊天，他们还可能偶尔用‘维权’这个词。但这两年，你几乎听不到了”，日本中国问题专家阿古智子教授说。阿古智子教授的学术方向涵盖了现代中国的社会运动、市民社会、人权、教育发展，以及战后中日关系。她特别关注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收缩，研究中国律师、记者、行动者如何在高压下持续表达，以及年轻世代如何找到新的方式进行社会行动。在这个访谈中，阿古智子教授讲述了中国公民运动近年来一个显著变化及原因，即为什么从维权世代过渡到了后白纸世代。2022年白纸运动后，新的“后白纸运动世代”身影开始浮现。有许多行动者移往海外，形成新的社群与聚点，不仅持续关心、思索中国议题，也更积极参与国际议题，行动方式比前一代更分散、多元。阿古教授注意到女权是现代年轻人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，分享了她对这个世代的观察与理解。最后，阿古智子教授还分享了她在日本策划的“战后八十年”系列活动。

阿古智子教授大学时期开始系统学习中文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她取得博士学位后陆续在日本多所大学任教，目前在东京大学担任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教授。

何欣洁女士是台湾离岛出版总编辑、离岛计划 The Rito Project 创办人。受《中国民主季刊》委托，正在东京旅行的她对阿古智子教授做了这个面对面访谈。

何欣洁（以下简称何）：您长期以来关心中国的基层社会发展与公民运动，但在近年来，中国的情形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就您的观察，这三年来，中国与华语世界的社会运动有哪些不同？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？

阿古智子（以下简称阿）：就我个人的观察，最大的变化，就是年轻人已经不再使用“维权”这个词了。我的印象是：三年前你如果跟一些二十几岁、三十岁左右的行动者聊天，他们还可能会偶尔用“维权”这个词。但这两三年，你几乎听不到了。

何：从今年回头看，您口中所说的“维权世代”，大约是指哪一段时间？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？

阿：我觉得可以从 2003 年的孙志刚事件算起，一直到 2015 年的 709 大抓捕结束。

2003 年，孙志刚是一位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因为没有暂住证，被抓进收容所，最后被打死。这件事震惊全中国，法律学者联名上书，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。最后政府真的废除了这个制度。当时经历这件事情的人们，开始相信行动能推动制度的改变。

接下来出现了一批律师，像许志永、滕彪等重要的行动者，他们推动“新公民运动”，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、教育平权，举办“公民课堂”等等。

现在回头看，我们很难想像这样的事情，但在 2000 年到 2010 年代初期的时候，这些行动是真实存在，而且非常蓬勃。

在那个年代，2011 年的乌坎事件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。现在很多人也许都已经觉得很陌生了，但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。广东乌坎村的村民因土地被强征起来抗争，最后以基层民主方式，选出了新的村委会。当时的乌坎事件，除了村民行动起来，各地的行动者、媒体、律师等不同角色的人们，还能互相配合，大家都觉得，要改变体制、改变中国是可能的。

在那个时期，女性的议题也有进展。比如冯媛推动《反家暴法》，许多当时的女权行动者也用不同的方式努力，推动了一些体制内的改变。2015 年中国通过《反家庭暴力法》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。

“维权世代”最后一个比较大型、知名的事件，应该是 2015 年的“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”。在这之后，体制的监控越来越紧、警察的骚扰越来越严重。任何公共行动，哪怕只是很微小的行动，都会马上被盯上。于是大家开始转到网路上，或只能在私下的场合里见面。公共空间一点一点消失，可以说进入地下化阶段。

在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后，其实人们行动的空间都变得很小很小，很多时候，行动是发生在网路上的。例如“李老师不是你老师”X 账户这样的行动，也很难再引起广泛关注，更别提要改变体制。

总体来说，“维权世代”过去交流的方式、空间，都在快速地变化，因此很多事情，也会变得很不一样。

#metoo 运动出现后，这个群体里面的男性行动者被爆料出现许多性骚扰、性侵害的事件，让年轻人非常失望，尤其是年轻女性，根本不想跟他们站在一起。种种的因素加在一起，让“维权世代”慢慢走向尾声，进入了“后白纸运动世代”。

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，大概就是疫情解封后，经历过上海封城、白纸运动之后，2022 年开始，这一个世代很清楚地浮现出来。

何：就您的观察，既然中国国内的空间已经被压缩到几乎消失，“后白纸运动世代”除了在网上联络，还会在哪些地方集结？

阿：正如你所说，中国言论控制得越来越严格，行动空间也越来越少，很多人只能在海外做些事情。

但就我来看，这些海外的中国人，并不是完全与国内的人断了联络。他们依然用很多低调的方式，和国内的人保持互动。海外的华人并不是放弃了中国的改革，因为，他们毕竟还是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。大家也会努力用华语来做各式各样的研究，想要打开行动的空间。

但是，也因为行动者本身在海外的原因，他们也会关注到他们所在国家的议题，并跟中国的议题作对照。

我觉得这是“后白纸运动世代”跟“维权世代”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地方。“维权世代”最活跃的时候，因为大家相信中国还有改变的可能，确实体制也还有一点空间可以行动，因此大家都是很关注中国的议题，虽然也有

一些国际交流的机会，但还是以关注中国自己国内的问题为主。

现在来到海外之后，不管是什么角色的人，例如留学生、海外经商的中国朋友，大家也会开始关注全球化的议题，因此大家讨论的事情越来越多元化、多样化。在这同时，大家也发现：中国这个国家，本身也在海外制造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大家开始发现，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，也开始用全球尺度来思考。这跟上一个世代就很不一样。

而且，除了中国的政治情况有了变化，美国也发生了变化。特朗普第一次上台，有些现象就让人忧心。第二次上台后，情况更是糟糕。他关停了很多中文媒体，相关的人权机构经费也受到影响，很多媒体甚至大学也开始对社会运动变得谨慎、甚至出现自我审查的现象。世界各国开始出现反移民、右翼兴起的浪潮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也都会影响中国社会行动的空间。

在这几年当中，香港也变了。在早年，香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流地点。许多媒体、NGO、学界的交流，都可以在香港举行，大家可以在香港见面。每年的六四纪念集会、研讨会，也都可以香港举办。

但随着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、香港国安法实施、苹果日报关门、黎智英被捕……一连串的事件，很快改变了香港的环境，过去存在于香港的空间也快速消失了。现在，香港也不是一个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了。

其实，台湾本来也是一个中国的行动者与海外的支持网络可以见面、交流的地方，但随着两岸关系紧张，这个空间也快速消失了。有些中国年轻人觉得来台湾太敏感，不太敢来；台湾政府也收紧了中国民众来台的管道，很多人没有办法顺利来台。

最后，大家因为香港、台湾情势的变化，反而聚集到日本来，东京成为一个大家可以相遇、会面的一个据点。

其实，日本传统来说，根本不是一个人权大国。但是因为前面说的种种因素，反而让许多中国或说华语世界的社会行动者聚集在一起，这是以前很难想象的事情。

正因为东京成了一个新的据点，我也有很多机会跟这些年轻人近距离相处。我在课堂上、在一些小型独立空间里，都看到很多年轻人聚集。他们在东京彼此连结、分享资讯、讨论未来，形成了一个新的空间。

何：就您的近距离观察，“后白纸运动世代”的行动文化，跟上个世代有什么不同？您跟他们相处的感觉如何？

阿：就我的观察，就像很多人注意到的一样，年轻世代是很积极参与在女权运动里面的。

白纸运动之后，很多年轻的女权运动者来到东京，他们举办集会与行动，声援“铁链女”、#metoo 运动受害者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，也安排上野千鹤子 (Chizuko Ueno) 老师跟他们交流。上野千鹤子老师是日本很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与行动者，当年轻人跟她面对面讨论，现场的感觉是非常好的，我自己也得到很多新的启发。

在过去，我自己虽然是女性，不过也不特别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社会议题。现在，我也跟着年轻人一起学习，获得了非常多不一样的观点。

何：许多人非常好奇，为何这几年女权运动特别吸引年轻人？您有什么观察吗？

阿：我的感觉是，女权可以有跨国的、共同的语言。这也是我刚刚说的，新世代在网路上交流、在全球尺度上思考的结果。譬如说，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的女权主义者，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但他们拥有共同的词汇，他们可以很快地用社交媒体彼此加强互动，很快地串联起来。

他们有许多人认识到，女性与 LGBT 群体，其实力量还是比较弱的，所以必须要联合行动。不然如果只是各自在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行动里，无法引起更大的关注。例如伊藤诗织 (Shiori Itō)，在日本国内其实是不能放她的电影的，她的电影是必须到国外去放映的。当然，她也有一些自己的争议，但总体来说，她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国际支持，应该是无法有突破点的。

还有一个重要的点，是大环境的改变，让“个人生活”与“个人感受”变成社会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以前维权世代的行动，会去诉诸法律，或者用政策倡议的框架来行动，但现在已经很难这么做，必须低调、地下行事，这让个人感受、艺术文化这些元素，在社会运动里面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
想要在网上串连跟你不一样的人们，只用过去的语言，是不够的。人们会比较跟自己有类似贴身感受的人共感，因此个人生活的各式各样问题：性骚扰、家暴、恋爱中的问题等等，都可以成为行动的议题。

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很好的。在过去的运动里，参与的人多是维权律师、公共知识分子，现在一般人都可以在生活上找到行动与交流的议题。就我的

认识，女权，其实就是一种从个人生活出发的社会运动。

不过，我也感觉女权运动接下来会面对挑战。我看到女权运动里面，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声音，这让我比较担心。其实，一个运动里面一定会有人比较温和、有人比较激进，不同意见的人彼此争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同意见的人彼此妖魔化对方。

就我自己来说，我站在中间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不只是一个旁观的研究者，也是参与在中国社会运动里面的参与者。在运动中，我可以理解那些急切的声音，但我也会提醒自己、提醒别人，不要忘记那些“还在门口的人”。

我们一旦放任某种声音压过了所有的声音，其他不一样声音的人，就会被排斥，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冲突。美国的公共讨论就是这样，出现了让社会分裂的情形。

人的社会是很复杂的，你可以表达你的立场，但也要跟其他人的立场去协调。牵涉到资源分配与国家预算问题的时候，一个政策还是要考虑各式各样不同的人。这是我的想法。

何：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八十周年，世界各地与日本国内都有许多的纪念活动。您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座谈与学习课程，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？

阿：是的，我们在今年与许多单位共同合作，组织了一系列名为“战后八十周年系列特别活动：战争记忆与战后秩序的形成”的研讨会。

我在这系列的研讨会中，特别强调“记忆”这件事情。我希望能从国际秩序、个人创伤、移民经验、战争废墟等各个不同的角度，来探讨战后东亚历史记忆究竟是如何被建构并重造的。我也邀请了各种很不一样的“战争亲历者”以及他们的后代，彼此交流、学习。

举例来说，让许多人都印象深刻的一场，是日本原爆受害者团体联合会（被团协）的田中熙巳（Terumi Tanaka）先生。“被团协”长期推动“世界不应该再有核武”等诉求，在 2024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

来到现场的田中熙巳先生，今年已经 93 岁。他是广岛原爆幸存者，国中一年级就遇上核爆。爆点离他家非常近，中间隔着山，家没有被夷平。但他记得那一瞬间只有白光、暴风、寂静。他从二楼冲下一楼趴下，玻璃压在身上却没有碎，他因此活了下来。

一周后，辐射的后果才显现。人们开始高烧、内脏溃烂、死亡。当时只有广岛、长崎的人知道核爆的可怕。因为占领时期的严格审查，全日本七八年后才了解。十一年后，幸存者才开始组织起来，成立被团协。

田中先生还讲到，他和母亲翻山越岭去阿姨家，沿途满是尸体，工厂也被热风扭曲。阿姨家在爆炸地点附近，已经夷为平地。他和母亲把遗体搬去火葬，他压抑情绪，直到捡骨时才放声大哭。

他现在 93 岁，还能独自从埼玉搭车到东大，全程三小时活动都参加，几乎没休息。而在问答的时候，来自台湾金门的王苓举手提问，想了解关于战争记忆如何被保存、再现与叙述的问题。他们的对话，就是非常珍贵的和平行动尝试。

除了与来自金门的人相见，我也特别安排了研究台湾原住民议题的学者与原爆受害者交流，探讨在日本殖民体制之下，台湾原住民的反抗如何被定义成“暴动”，我们后世的人又该如何理解这些叙事。我希望，广岛的历史创伤与台湾原住民族的记忆，可以交织、激荡出新的观点。

在其他议程中，我们也播放了《由岛至岛》纪录片，探讨台湾人在日本殖民时期以“日本军人”身分一起参与屠杀东南亚民众的历史责任，以及来自冲绳的作者青山惠昭 (Aoyama Keishou)，如何追寻家族与战争的记忆。

其实，多数日本人并不想打仗，原子弹的记忆也带来极深的创伤。在战时，许多人甚至必须依靠吸毒才能执行杀人的命令，而回到日本之后，他们依然深陷痛苦之中。这些记忆往往难以消化，许多人因此罹患精神疾病，或者把暴力带回家庭，对孩子施加家暴，被打的孩子同样成了战争的受害者。

战后八十年，这些记忆依然存在。即使是加害者一方，也背负着沉重的创痛。在基层社会，许多人其实深深受苦。我们虽然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，但透过个人记忆作为一种历史文件 (ego-document)，仍然能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也提醒我们不要让历史重演。

总体来说，人是多元而复杂的，如果只从“国家”的角度去思考，会有很大的限制，也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。像“美国优先”、“日本优先”这样的视角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但若是从个人、岛屿、不同社群的角度切入，就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思考方式。

当然，我不会否认主权国家的重要性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许多给予需要被照顾者的社会福利，也还是通过国家来发放，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国家这个层

次去思考，是不够的。

何：听说在金门年轻人主讲的课堂上，刚好有来自福建厦门的学生，双方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交流？

阿：是的。那场关于金门与澎湖群岛的工作坊，我觉得对于现场的年轻人来说，是一个以多重视角来看待战争记忆的一次体验，非常新鲜。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，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，仍然有非常多的人留下来讨论。

当时，刚好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也在东大访学，因而可以参加活动。而在参加的学生里，有一半是来自中国的学生。当来自金门的王苓分享了她家乡的战争故事，中国学生们也接连举手发言。特别是来自福建、甚至厦门的学生们，其实也很不希望自己的家乡成为战争的前线。因为，只要战争爆发，台湾的军队也可能会攻打厦门作为反击，这在 1950 年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而自古以来，金门与他们的家乡厦门仅有一水之隔，在文化、经济、社会方面都有深厚的联系，双方都不希望战争给家乡带来伤害。就这点而言，来自台湾金门的王苓，与来自中国福建沿海的学生们，双方想法是一致的。

在课堂上，来自各地的学生、日本民众，可以亲耳听到王苓这样一位具体的人，说她们金门的岛屿历史，以及她与中国丈夫共同抚养着可爱的双胞胎的故事，让人感触良多。来自澎湖群岛的欣洁你所作的分享——澎湖作为军事据点存在得太久了，久到这种状态已经渗入日常、几乎被当地人所忘记——也让大家对于战争、备战状态有了更深的思考。

考虑到当前的政治情势，像这样的活动在中国、香港、台湾进行都会很困难。正因为日本处于中间的位置，才能够做这些事。正因为在这里言论空间相

对开放，社会也有接纳各种背景人士的包容力，这些活动才有可能。彼此学习、彼此理解，才是防止战争最有效的方法。我觉得我们必须努力维护这样的学习环境。

在稍早，今年二月，我已经安排一群东京大学的学生前往金门参访，同样也是由王苓出来接待与安排课程。这样的交流，让日本的年轻人，对战争能有更多的反思。举例来说，其中一个由当地议员带着我们参访村落的行程中，学生们感触良多。

金门县议员董森堡先生，带我们参观董氏一族自古居住至今的传统同姓村。村里有宗祠和许多老屋，但都还留着战争的痕迹，建筑墙壁上清晰可见的弹孔便是见证。

在学生们边走边听董议员解说的时候，耳边传来了枪声。原来是村子附近至今仍有台湾军队在使用的靶场，当天正在进行实弹演习。这样的演习，在两岸情势紧张后，举行的频率也越来越密集。

此时，董议员告诉我们，他的一位亲戚，在战争期间便因为被流弹射击而失明，也有孩子们捡了随处可见的共军炸弹来玩，结果突然爆炸，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。在当地，这样的故事很常见。六、七十岁的长辈中，许多人的手、脚是残缺的。

董议员的父亲在两岁时曾经随祖父一同疏散到台湾，之后才回到金门居住。董议员自己则说，当他在台湾念大学时，第一次觉得“听不到炮声是件新鲜的事。”从这些经历就能理解，他确实是在战争的阴影下成长的。

听完这些故事，有东大的学生分享：“以前只是在概念上理解国际政治，在金门听到具体的人与故事，才看见了一张张真实的面孔，开始理解到什么是人类的安全保障。”

我觉得这样的活动，其实非常有意思。因为在过去，如果单纯以“中国”或“日本”为单位来讨论战争问题，马上就会变得过于沉重，年轻人往往也不敢触碰。但若是把台湾、冲绳等地的因素纳入，从“岛与岛”的视角来思考，事情就不再只是简单的“谁是好人、谁是坏人”的二分法。也能有更多的讨论面向跟感受。

何：在传统的公共议题讨论时，人们往往习惯用“左翼”与“右翼”对个人的立场来进行指认，同时贴上许多分类标签。例如，传统的日本左翼往往比较与中国友好，右翼对许多议题也有既定的立场与态度。而近日以来，日本国内“反对移民”，尤其是针对中国移民的声浪似乎节节高升，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？

阿：一直以来，我的研究领域相较于其他学者，其实是比较特殊的。譬如我关心香港、中国人权，但我也关心日本、台湾原住民的研究，乍看之下不是同一个领域，但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，而且也是互通的。

举例来说，在传统学术上会关心原住民的人，好像是比较“左”；但一般又认为，作中国人权议题的人，是偏“右”的，但我是混杂的。我会认为这两者一样重要，而且是从同一根源上衍生出来的问题。

譬如说，采访前我刚刚收到一封产经新闻的读者给我的信。读者在信中表示，觉得我好像有点左翼的立场，但好像又不十分确定，他觉得有点混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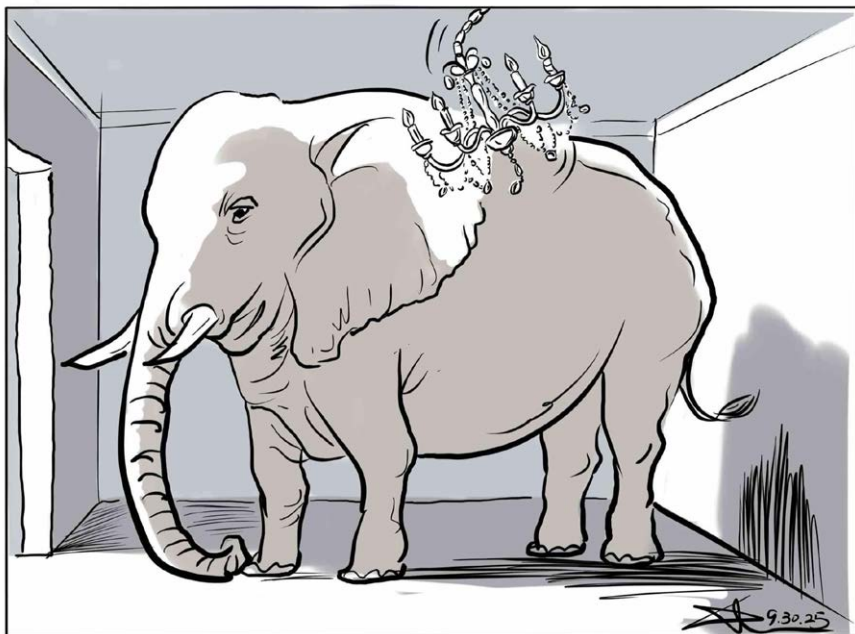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我最想做的事情是，我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去思考这些问题，不一定要待在传统左翼、右翼的范畴里面去思考。左边的人也可以站在右边的立场思考，反过来也是。

我现在跟一些中国年轻人一起做事，有些年轻人也有一点讨厌日本的心态，但我并不会直接批判他们，我们就慢慢地一起前进，他们也都愿意让步。

如果说什么是我一定不能接受的，就是一些触及基本底线的问题。比如说，有一次的国际交流上，一位中国学生就直接说“是不是日本学生连日本跟美国有战争这种事情都不知道？”我当场就告诉她，这个发言有点太极端了，你好像不应该用全称式的“日本人”来讨论这件事情。

确实，有些日本人的历史知识是极为缺乏的，但也不至于连日本与美国发生过战争都不知道。当你以全称式的“日本人”、“美国人”、“中国人”来讨论问题，然后武断地说“日本人都如何如何”，我觉得就太过分了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脸孔，我们应该先了解彼此，先不要觉得这个人是某个国家的人，所以他就如何，这非常重要。

至于日本国内的反移民情结，我感觉以前的各种国际之间的交流、学生交流也都会有冲突，但社群媒体放大了这个冲突。这是我十分忧心的，也应该要继续努力，防止这件事情恶化下去。



作者：吴玉仁